

从通道到遵义的系列会议 / 薛庆超

红军存亡关头的通道会议 / 林顺万 黄振东

长征亲历者谈黎平会议

猴场会议是中央红军战略转兵的重要组成部分 / 肖文豪

历史转折性的遵义会议 / 伍修权

29 读·党史 第29辑



历史转折：从通道到遵义

静姝 / 编

历史转折：
从通道到遵义

29 读·党史
第29辑



历史转折：从通道到遵义

静姝 / 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历史转折:从通道到遵义/静姝编.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
2017. 4

(读·党史)

ISBN 978-7-5098-3705-4

I. ①历… II. ①静… III. ①中国共产党—党史—基本知识
IV. ①D23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58042 号

启事:本书选用的部分文字、图片,来源于各正式出版物。其中还有部分作品尚未与有关作者、编者取得联系,我们深感不安。恳请有关权利人联系我社,我们将按《著作权法》的相关规定支付稿酬。
(联系人:贺冬英 电话:010—82517196)

出版发行:**中共党史出版社**

责任编辑:张政

复 审:潘鹏

终 审:汪晓军

责任校对:龚秀华

责任印制:谷智宇

责任监制:贺冬英

社 址:北京市海淀区芙蓉里南街6号院1号楼

邮 编:100080

网 址:www. dscbs. com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145mm×210mm 1/32

字 数:115 千字

印 张:5

印 数:1—3100 册

版 次:2017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201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098-3705-4

定 价:12.00 元

此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请与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业务部联系
电话:010—82517197

写在前面的话 / 王素莉

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在内战时党内有两条路线：一条是“左”倾教条主义路线；一条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左”倾教条主义给中国革命造成的危害极其严重，它导致除陕甘以外各主要根据地的丢失和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组织的严重破坏。如陆定一所说：“遵义会议是由错误路线转变到正确路线的关头。”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1935年10月，红军被迫长征。湘江战役损失惨重。由红军长征出发到这时，中央红军从8.6万人锐减到3万多人。渡过湘江后，领导层对中央红军的前进方向一直存在争论。12月12日，中共中央在湖南通道召开临时会议，确定西进贵州。红军迅速跨入贵州境内，12月15日占领黎平，打开了红军向贵州进军的通道。

进入贵州时，红军已经处在生死关头，党和红军中大多数人认识到再也不能按照“左”倾错误路线走下去了。12月18日，中共中央在黎平召开政治局会议，根据毛泽东建议，通过了决议，放弃到湘西北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贵州北部进军。“会议改变了建立根据地目标所在是一个大决策，是红军长征中战略转变的开始”，中央红军开始由被动转向主动。

1935年1月1日，中共中央在贵州瓮安县猴场召开政治局会议，通过《中央政治局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在建立新根据地的具

体目标上，猴场会议和黎平会议基本一致，依然“以黔北为中心来创造苏区”。如周恩来所说，此时已处于“历史转折的前夜”。

1935年1月7日，红军攻克黔北重镇遵义。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比较系统地批评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严重错误，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上的帮助者”。对中央红军当前的行动方向，会议做出“北渡长江”的新决定，这是对红军在何处建立根据地的目标所做的又一次重大改变。遵义会议解决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问题，开始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

会后不久，在向云南扎西地区进军途中，政治局常委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中央总的责任。3月中旬，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新的“三人团”，以周恩来为首，负责全军的军事行动。

遵义会议以后，毛泽东的指挥战略在红军作战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指出：“我们的战略应该是决战防御（攻势防御），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的弱点，在运动战中，有把握的去消灭敌人的一部或大部，以各个击破敌人，以彻底粉碎敌人的‘围剿’。”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在毛泽东领导下摆脱了“左”倾教条主义的束缚，根据实际情况变化，灵活地变换作战方向。刘伯承后来回忆说：遵义会议以后，我军一反以前的情况，好像忽然获得了新的生命，迂回曲折，穿插于敌人之间，处处主动，生龙活虎。终于成功地摆脱了几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决定性的胜利。

（本文作者系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

目录

CONTENTS

► 写在前面的话

► 综 述

1 从通道到遵义的系列会议 /薛庆超

► 通道会议

6 红军存亡关头的通道会议 /林顺万 黄振东

► 黎平会议

10 为遵义会议奠基的黎平会议 /侯保重

16 转兵贵州 /杨尚昆

20 长征亲历者谈黎平会议

► 猴场会议

25 猴场会议：取消错误军事指挥 /余福仁

28 猴场会议是中央红军战略转兵的重要组成部分 /肖文豪

目 录

CONTENTS

► 遵义会议

- 37 遵义会议的回顾 /杨尚昆
- 42 历史转折性的遵义会议 /伍修权
- 47 毛泽东在遵义会议进程中的作用及影响 /邱乘光
- 61 在历史转折关头的张闻天 /程中原
- 70 周恩来对遵义会议的历史贡献 /苏莉莉
- 76 邓小平是否参加遵义会议引起的一场风波 /张 曙
- 83 王稼祥与遵义会议 /程 龙
- 92 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 /陈 云
- 99 毛泽东谈遵义会议 /刘明钢

► 论 点

- 106 遵义会议前三次会议的历史贡献 /张治宇
- 112 遵义会议与毛泽东领导地位的确立 /蒋建农

► 链 接

- 126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的神奇用兵 /石仲泉
- 146 遵义会议的三个动态过程 /张黔生
- 154 编辑手记 /张 政

从通道到遵义的系列会议 /薛庆超

1934年10月,中共中央领导中国工农红军,从南方各个革命根据地相继开始长征。1936年10月,中共中央和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西北,把中国革命的重心从南方转移到了北方,为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实现中国共产党从土地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战略转变,奠定了基础。

通道、黎平、猴场三次会议: 决定红军新的长征方向,为遵义会议奠定了基础

1934年10月,中共中央和红一方面军开始长征,于11月底到达湘黔边界。在不到两个月的长征中,红军损失惨重,由出发时的八万

余人减少到三万余人。此时,从共产国际来的李德不顾蒋介石已调集几十万大军到湘西堵截红军的客观形势,坚持其原定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这样,中共中央和红军将面临全军覆灭的危险。在关系到中共中央和红军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毛泽东在中央负责人讨论进军方向问题的紧急会议——通道会议上,挺身而出,力挽狂澜。他分析了客观形势,批驳了李德的错误意见,力主放弃前往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提出改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的主张。毛泽东的主张得到了王稼祥、张闻天和周恩来等多数中央领导同志的赞成。根据

毛泽东的意见，红军从通道突然改向贵州方向进军，使蒋介石妄图在通道以北“围歼”红军的阴谋宣告破产。此后，拥护毛泽东出来领导党和红军的呼声渐高。

红军进入贵州占领黎平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黎平会议。在中共中央负总责的秦邦宪与李德仍坚持由黎平北上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创建新的根据地。毛泽东主张继续向贵州西北进军，在川黔边地区建立根据地。经过激烈争论，由于王稼祥、张闻天等多数人赞成毛泽东的意见，会议肯定了毛泽东关于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的正确主张，从而再次否定了李德、博古想去湘西的错误意见。黎平会议通过的《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指出：“鉴于目前所形成的情况，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建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会议决定，红军继续向贵州西北前进，“应坚决消灭阻拦我之黔敌部队，对蒋、湘、桂诸

敌应力争避免大的战斗”。会议根据中央领导层存在争论的情况，决定到遵义地区后，开会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

黎平会议后，毛泽东得以参与红军行动的决策，指挥红军向贵州腹地挺进，于12月底占领乌江南岸的猴场。此时，在红军进军方向问题上再次发生争论，李德、博古提出红军不过乌江，回头东进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错误主张。1935年1月1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的猴场会议上，多数同志仍然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会议重申由毛泽东提出并经中央政治局黎平会议同意的在川黔边地区建立新根据地的主张，作出了《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其中专门规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这就取消了李德以“军事顾问”身份独揽军事指挥大权，以个人专断取代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集体领导的不正常做法，把军事指挥权重

新收归到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与中央政治局。

中央革命根据地和中央红军在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指导下惨痛失利的事实，沉重地教育了中央领导机关中部分犯过“左”倾错误的领导同志。长征的过程，实际上也是部分犯了“左”倾错误的领导同志逐步认识并抛弃“左”倾冒险主义的过程。毛泽东为此做了大量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他怀着对中国革命前途的无限忧虑，首先同王稼祥进行了亲切交谈，列举过去成功的经验，对“左”倾冒险主义提出了批评。王稼祥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毅然同“左”倾冒险主义决裂，“干脆地表示，要把博古（秦邦宪）、李德他们轰下台”。毛泽东还同张闻天谈了“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问题，对他进行启发和教育，“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红军主力被迫长征，使张闻天从沉痛的教训中，认识到王明路线的错误和毛泽东主张的正确，长征开始后，毅然参加了反对王明路线的斗争”。王稼祥、张闻天的转变，是

党和红军要求改变“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尽快摆脱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被动局面，要求毛泽东出来领导中国革命的愿望在党的中央领导机关的反映。而通道会议、黎平会议和猴场会议，则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奠定了比较统一的思想基础和政治基础。

遵义会议实现伟大历史转折

1935年1月7日，红军占领遵义。这时，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等向中共中央提出，立即准备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在遵义举行。

出席会议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陈云、博古；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有：王稼祥、刘少奇、何克全。参加会议的还有红军总部和各军团主要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邓小平等。此外，共产国际来的军事顾问李德和翻译伍修权也列席会议。

博古主持会议并代表中央政治局常委作关于反对敌人第五次“围剿”的总结报告。他虽然对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作了一些检讨，但主要还是强调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在于各种客观因素，如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力量的强大，白区和各个革命根据地的斗争配合不够等。实际上是在坚持错误立场，为“左”倾错误军事路线辩解。

周恩来作了关于军事问题的报告。他实事求是地分析了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主要原因，指出是军事领导的战略战术的错误，批评了李德脱离中国革命实际的“瞎指挥”，“并就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进行了自我批评，主动承担了责任”。周恩来的这种态度具有深刻的思想基础。

张闻天按照与毛泽东、王稼祥共同商量的意见，作了反对“左”倾军事错误路线的报告，比较系统地批评了博古、李德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毛泽东作了长篇发言。他将锋芒集中在当时最迫切

的军事问题上，针对博古强调客观原因、竭力推卸责任的辩解，列举大量事实，针锋相对地进行了有力的批驳，尖锐地批判了博古、李德推行的错误的“左”倾军事路线，认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指挥上和战略战术上的错误。毛泽东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有理有据的发言，得到与会绝大多数同志的赞同和拥护，“左”倾机会主义者和李德成为众矢之的。王稼祥接着发言。同意毛泽东的讲话，指出博古和李德等在军事指挥上的严重错误，尖锐地批判了他们“单纯防御”的指导思想，拥护毛泽东出来指挥红军。

朱德、周恩来和绝大多数与会同志在发言中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批判错误的军事路线，要求改换中央领导，赞同毛泽东出来领导。

会后，陈云在《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中指出：“扩大会议中恩来同志及其他同志完全同意洛甫及毛、王的提纲和意见，博

古同志没有完全彻底地承认自己的错误，凯丰同志不同意毛、张、王的意见。”

遵义会议最后一天，讨论了中共中央领导机构的改组等重大问题，决定：(1)毛泽东同志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2)指定洛甫同志(即张闻天)起草(遵义会议)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3)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4)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

托的对于军事指挥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人。

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央的领导地位，在中国革命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遵义会议是党从幼年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是党的历史性伟大转折。

(节选自薛庆超：《中共中央在长征中召开的重要会议》，《党史纵横》2007年第11期，标题为编者所加)

红军存亡关头的通道会议 /林顺万 黄振东

在大型史诗性电视、电影巨片《长征》中，有中国工农红军经历湘江血战，由八万多人减到三万人，在通道会议上毛泽东为工农红军转兵贵州与李德、博古激烈争论的一场戏。看到这里，有心的观众或许会问，通道会议和转兵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早在第五次反“围剿”遭到失败，中央红军准备突围转移前，即1934年七八月间，执行“左”倾错误领导和指挥的博古、李德，就确定“到湘西洪江建立新的根据地”。是年11月，贺龙和萧克率领的红二、六军团在湘黔边境会合并进入湘西发动攻势后，博古、李德便确定要去湘西会合红二、六军团。

蒋介石为了消灭向西突围转移的八万多红军，在赣、粤、湘、桂边组成了四道封锁线。中央红军虽然突破了这四道封锁线，却遭到了巨大损失，特别是通过第四道封锁线——抢渡湘江后，仅剩三万余人了。

在抢渡湘江以前，蒋介石就察觉中央红军有北去湘西会合红二、六军团的战略意图。为了阻止中央红军实现“与贺萧合股之目的”，蒋介石于11月17日在南昌行营发布了《湘江以西区域剿匪计划大纲》。这个大纲规定，在“黎平、锦屏、黔阳之东，黔阳、武冈、宝庆之南，永州、桂林之西，龙胜、洪州之北”，布下重兵，消灭红军。中

央红军突破湘江后，蒋介石虽有预测并早有准备，但仍是坐卧不安，他说：“若再任期窜黔扰川，与贺、萧、徐匪联成一气，则甚为祸之烈，不堪设想。”于是，指令各路军抽调劲旅，继续穷追，着力堵截。

在蒋介石的这个计划中，北面是重点。这里有何键的十六七万“劲旅”。何键坐镇邵阳，指挥刘建绪的第一兵团、薛岳的第二兵团，还有地方保安部队六个团，扼守着中央红军去湘西的必经之路——新宁、武冈、城步、绥宁、靖县、会同、洪江、黔阳、芷江一线，修筑了四道严密的碉堡防御线。仅城步、绥宁、靖县、会同和黔阳五县，就有211座。敌人张开了一个大口袋，“守株待兔”。

是按原定计划北上湘西会合红二、六军团，还是改变计划另辟蹊径呢？这在中央领导人之间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掌权的博古、李德坚持要去湘西会合红二、六军团。湘江战役尚未结束，军委即令前锋一军团侦察由西延北上城步“到湖南去”的道路。12月3日，

军委得知湘敌已察觉红军北上意图，派重兵堵于城步一线，军委只好改变计划，“继续西进”。次日，军委即决定“以继续西进至通道以南及播阳所、长安堡地域之目的”，来规定逐日之行动，准备从通道北上湘西。经过八天的边走边打，红军部队陆续进入通道。如果不放弃原来的意图，就必须与五六倍的敌人决战。而这时部队的战斗力又空前减弱，要是仍旧采用正面对垒战，和优势敌人打硬仗，显然就有覆灭的危险。

在这危急关头，毛泽东站了出来。虽然他自长征出发前就一再向中央局领导人进言献策均未被采纳，但他并不泄气。几天来，他在行军途中找王稼祥谈，找张闻天谈，劝说军委领导人改变计划，不要去湘西会合红二、六军团，改道西南，到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去，以摆脱湘西之敌。

1934年12月12日这一天，地上打着重重的白头霜，暖烘烘的太阳迟迟到中午时分才肯露出头来。霜重色更浓，满山枫叶红。这

一天，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是一个不寻常的日子。随中央第一纵队行进的博古、李德、周恩来、朱德，随中央第二纵队行进的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等领导人，都在这一天先后到达通道县境内的芙蓉村。原定从通道北上的目的地已经到达。是按原计划由此向北去湘西会合红二、六军团呢，还是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呢？在这里，中央领导人对于这个关系红军生死攸关的问题，不能不作出决断了。于是召开了有博古、李德、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王稼祥参加的紧急军事会议。毛泽东是新建议的提出者，被邀请出席。

会议争论得很激烈。李德仍

坚持原来的计划，北上湘西会合红二、六军团。他请大家考虑：是否可以让那些在平行路线上追击我们的或向西面战略要地急赶的周浑元部和其他敌军超过我们，我们从他们背后转向北方，与二军团建立联系。我们依靠二军团的根据地，再加上贺龙和萧克的部队，就可以在广阔的区域向敌人进攻，并在湘黔川三省交界的三角地带创建一大片苏区。可惜李德的这番话只是纸上谈兵。他无法说清在敌人已经察觉红军要北上湘西的意图下，有什么办法能让那些在平行线上追击我们或向西面战略要地急赶的周浑元部和其他敌军赶过我们，自己又怎样在他们的背后转向北方。

毛泽东明确地反对这一意见，提出放弃去湘西会合红二、六军团的意图，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他以中肯的分析和雄辩的口才说服了大多数人。他不仅得到了张闻天和王稼祥的支持，



通道会议会址

而且得到了当时就准备转向“中央三人小组”一边的周恩来的支持。朱德向来尊重毛泽东的意见。就连博古，虽然不想放弃去湘西会合红二、六军团的企图，但是他也认为“从贵州出发可以一直向北，在那里才真正有可能遇到很少的抵抗”。因此，毛泽东的建议被通过了。李德感到孤立，过早地走开了。最后决定的全部内容，是由周恩来事后转告给他的。

于是，一个关键性的时刻到来了。根据这个会议的决定，朱德于当日的19时半以军委的名义签发了一份“万万火急”的电报，命令各军团和纵队首长，“13日西进及进占黎平”，由于黔东的空虚，15日中央红军顺利占领了黎平。18日，在黎平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进一步肯定了毛泽东关于放弃去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企图，改向贵州进军，创建新的根据地的正确主张，并根据新的情况，作出了在川黔边建立新根据地的决定。

通道会议及其转兵的历史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首先，从危急中挽救了党和红军。其次，重新开始了毛泽东对红军的指挥。毛泽东自1931年被撤销苏区中央局书记，1932年被撤红军总政委和前敌委员会书记后，只剩下一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职务，而且是个虚职。但是，毛泽东在这种逆境中，并不因个人大权旁落而消沉，而是日日夜夜为党和红军的前途和命运操心。从突围前开始直到湘江一战损兵过半，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奉献良策，虽未被采纳，但并不灰心。他经过多方面的努力，得到了张闻天、王稼祥等同志的支持后，促成了通道会议采纳了他的正确决策。这样，自长征以来，他才第一次真正地参与了重大决策的讨论和研究。最后，为黎平会议和遵义会议的召开创造了条件。

毫无疑问，通道会议是历史转折关头的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由失败走向胜利的一个新起点。

（摘自《档案时空（史料版）》
2005年第3期）

为遵义会议奠基的黎平会议 /侯保重

通道会议后的敌我态势

中央红军遵照军委命令，于1934年12月13日，开进贵州省黎平县。黎平县位于贵州省东南边陲，东面同湖南省通道县相邻，南与广西省三江县接壤。它是黔东南通往湖南和广西的主要交通要道。

红军抵达通道地域时，敌军先期在通道以北的靖县、黔阳。会同等地布下了三道堡垒封锁线；西面在贵州的锦屏、茶平一线，由黔军一个团和民团设防，黎平有一个团设防，而黔军“双枪兵”的力量都很弱，没有多大战斗力；东、南两面由广西军阀两个军和湘军一部在尾追进击，主力在全州地区堵截。

通道会议后，中央红军突然转兵贵州，挥戈西指，在13、14日两天，红军各部实际上已向黔东北方向插去，“寻求机动，以便转入北上”，为转移到湘西作准备。军委电令红一军团“迅速前进以便先敌取得和控制剑河渡河点”。16日又命令红一、九军团“准备渡过清水江，然后北上，同前出泸溪、乾城、凤凰地区的二、六军团会合”。

在红军西入贵州的同时，蒋介石又重新调整了军事部署，发布所谓的《湘黔川实施“剿匪”计划大纲》，除命令湘、黔军阀部队巩固原防线外，又命令：“以追剿部队之一部，追至铜仁，巩固黔军左侧之防线。”13日何键命令：“第